

G 专家论坛

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及其启示

□ 陈桐生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故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差异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

G 项目成果

近代短篇小说的复兴

□ 陈大康

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历史始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世的都是长篇历史小说。冯梦龙“三言”的问世打破了这一格局，他还在《古今小说》封面上作“识字”为短篇小说宣传：“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短篇小说创作就此步入繁盛，从明天启年间到清雍正朝，作品总数已达六百余篇，较优秀者也不在少数。然在随后百余年里，短篇小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光绪末年才重新现身。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创刊。在梁启超主办的前七期里，只刊载过《俄皇宫中人之鬼》《毒药案》《白丝线》三篇短篇翻译小说与文言小说《唐生》，自创通篇小说却无一篇也无；该刊向社会征稿，也明确要求“章回小说在十数回以上”，短篇小说则未见其眼。稍后创刊的《绣像小说》共出版七十二期，同样也不刊载自创的短篇小说。直到日报刊载小说成为流行现象，通俗短篇小说才重新受到人们关注。

日报刊载小说始于《申报》，它在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伊始就接连刊载三篇翻译小说，随后又紧急刹车。报载小说是全新的传播方式，它的猛然出现，一时无法与中国读者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相融合，更何况刊载外来的翻译小说。《沪报》是刊载小说的第二家日报，它在光绪八年(1882)创刊后三周，就开始连载《野叟曝言》，一直持续了两年半。当时这部作品售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

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如铭文)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就是说“文言”词汇要比“殷商古语”浅显易懂得多，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

G 项目成果

近代短篇小说的复兴

□ 陈大康

价每部六元，《沪报》是每日随报附送不收分文，且以书版格式刊印，便于读者自行装订成册。小说连载以来，“购者踵趾相接”，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消除了读者对新传播方式的抵触心理。此后，沪报又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等作品，都受到读者欢迎。

大众接受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但此时中国近代新闻业刚起步不久，直到戊戌变法后，日报才渐多，而办报者发现“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后，报载小说便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起初，各家都连载长篇小說，既有大众习惯阅读的本土创作，又有一些翻译小说。这么多家家日报以及刊物都要刊载小说，创作或翻译者毕竟有限，一时间稿源便成了大问题。大家习惯了的长篇连载也出现了麻烦。得益于印刷业近代化改造，小说单行本再也不会见下文，这些都会招致读者不满，从而影响报纸销路。如果有批短篇小说在手，连载暂停时便可顶替，或者干脆以短篇为主，长篇连载为辅，那么读者的不满多少可得到化解。也就是说，因形势逼迫，短篇小说将应时而生。

一个偶然事件使设想付诸实

践。《时报》自创刊就连载陈景韩翻译的《伯爵与美人》，他东赴日本，临行前多翻译了一批供自己外出时连载。可是他走后，《伯爵与美人》的未刊稿居然找不到了，作品连载暂停了三个月。其间，陈景韩从日本寄来短篇小说《马贼》以救急，《时报》又接连刊载了《中间人》《张天师》等短篇小说，填补连载暂停时的空白。由于读者习惯的是一长篇小说连载，《时报》刊载《马贼》时特地刊登广告解释，“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读者不必见怪，那篇小说篇幅虽短，却同样“立意深远，用笔宛曲，读之甚为有趣”。该报继而进一步向社会征集这类稿件：“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报，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自此，《时报》开启了向社会征集短篇小说的序幕。

《时报》向社会征稿，特别是征集短篇小说的举措便引起连锁反应。当时的很多报纸先后加入向社会征集小说稿件的行列。可能《笑林报》稿件短缺的危机尤其甚，心情也更迫切，竟在一周内两次刊登征稿启事，第一次明确地“征短篇小说”，第二次则说“本馆征求时事、言情及各种小说”；《天铎报》开列的征集范围是：“种类：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短篇小说”，同时还要求“文俗夹写，毋取高深”，以适应大众的阅读。

同治年间《申报》向社会征集诗文时，以“概不取其刻资”即不收版面费为鼓励，此时应征者多而版面有限。光绪末年报纸是为开掘小说稿源而征文，这就须得给予相

G 项目成果

近代短篇小说的复兴

□ 陈大康

应的报酬，否则应征者寡，小说刊载断档，报纸销量会受影响。对报社来说，这个观念的转变有点痛苦，不少报纸征文时对报酬都含糊其辞：或含糊地许诺“相当之酬报”，或笼统说“润笔从丰”，或表示“本馆决不惜厚资也”。说得都很慷慨，但谁都闹不清“酬”与“劳”如何对应。有的报纸则表示愿意和应征者一起商定，“每千字需酬金若干，并请开示，以便商议”。《时报》的态度倒是明确，每篇短篇小说“赠洋三元至六元”，《天铎报》按千字论价，分为二元、一元半与一元三等。当时各报都急需稿源，激烈的市场竞争最后终于使稿酬制度化，从而为作者队伍的形成，为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在物质层面提供了保障。

一时间大批作品蜂拥而至，当时的人曾感叹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不少人仓促上阵，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就总体而言当属平庸一类。有些作者往往是听到或看到些什么，就匆匆记录，稍作润饰便算完稿，作者对描写对象未作深入思索，批判也属表面化。创作时对于生活素材缺乏概括、提炼与捏合，人物形象只是粗线条的刻画。仓促动笔自然无法对事件作本质性开掘，只能是对现象的描绘与嘲讽，就连小说名家包天笑也承认“急就成篇，容有支离矛盾处”。这种创作现象的出现也易理解，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大小事件层出不穷，变幻节奏又急速，此时日报小说的创作

既要跟上社会的快速变化，又得及时呼应读者的需求，往往只能拿出“急就章”。不过，这些作品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发声，易引起读者共鸣，各篇虽只叙述某一件事，而汇合众作品，则显示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众生相。其时短篇小说多刊载于日报，其读者众多，作品有较大传播面，而各地不少报刊在靠转载维持，它们所转载的，也大多是短篇小说。

日报小说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只有196种，普遍实行征文的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便蹿升至422种，宣统朝的三年里更一直保持500种以上，这其中大部分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也开始面世，还得到了“其文辞简劲，其思想锐奇，若讽若嘲，可歌可泣，雅俗共赏，趣味横生，为小说界别开生面”的赞誉。小说名家也接受了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长篇享誉文坛的吴趼人，此时就接连撰写了多篇短篇小说刊登于报端。一向引领创作潮流的小说专刊也开始重视短篇小说，《小说林》前有意为短篇小说安排了相当篇幅，后有40篇作品中竟占了22篇；而出版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小说月报》，此时向社会征稿就特地声明：“本报各门，皆可投稿，短篇小说，尤所欢迎”，同时还允诺了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的较高稿酬标准。

当创作呈现如此态势时，可以说清中叶以来消失了百余年的短篇小说，至此实现了自己的复兴。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小说史论”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网络词汇层出不穷。这些网络词汇良莠并存，人们对它们褒贬不一。虽然与传统汉语词汇相比，网络新词的数量还很小，远不足以取代传统汉语词汇，但是千万不可轻视网络词汇这一新的现象。汉语发展史表明，古今语法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词汇，“殷商古语”变“文言”，“文言”变“白话”，主要都是词汇的变化。未来网络新词走向如何，是否会继续发展壮大，是否有一天会演变成继“殷商古语”“文言”“白话”之后一种新形态的主流书面语，目前还不好预测，也不必过早地危言耸听。但是，对网络新词保持一种理性的开放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使之成为当代文学语言中的新鲜血液，以此服务于新时代的文学事业，进而促进文学的繁荣，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化创新必须处理好继承传统与革故鼎新的关系。任何文化创新都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努力吸取优秀传统文化。但是，传统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护，当传统成为文化创新的包袱或障碍时，就应该冲破一切不合理的陈旧传统，扫除一切创新道路上的障碍。文化创新永远在路上，一项文化创新完成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旧传统，成为下一个文化创新的基础。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永远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常变常新。“殷商古语”被“文言”取代，后来“文言”又被“白话”取代，虽然这两次文学语言重大变革采取了不同形式，前者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后者则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振臂提倡，但它们的实质都是对传统语言的革新，而革新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旧的文学语言已经积弊甚深，严重脱离现实民众生活口语，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因此不得已而承敝易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言如此，文化亦然。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负责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G 研究心得

宋代科学技术不仅达到中国历史以来的顶峰，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如活字印刷术方便了思想的传播、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火药使用于军事等。造船业的空前发展也是其突出体现。

宋代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和海上贸易空前繁荣，极大地推动了造船业发展，船舶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这一经济格局的变革也导致国家漕运、商业流通、海上贸易和百姓生计对船舶的依赖空前增强。以北宋漕运和南宋江海防为例。北宋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使漕运成为事关国家机器运行的重大任务，漕船制造因此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在多路设置造船场，每年漕船制造额多则三千余艘，少则两千余艘。漕船的保有量至少在一万五千艘以上。南宋江海防成为国防要务。南宋逐步建立起了川陕、荆襄、江淮和海防组成的国防体系。在江海防中，南宋以江防为根本，淮防为藩篱，海防为辅助，形成了与金朝在江淮正面争锋的格局。南宋有效利用舟楫之利，在几次关键水战中打败了金朝，保障了国家安全。由于江海防的重要性，南宋战船制造和保有量比北宋漕船更大。南宋与元朝在长江中下游展开的鄂州水战、江夏洲水战和焦山水战三次大水战中，每次双方共投入的战船都达两万艘或更多，而这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战船规模。宋代河湖沿海民众的

生计与船舶联系十分紧密。内河、湖泊都有经营渔业或交通运输的以船为家者，沿海地区如广南船民、福建白水郎等也是以船为家者，而从事渔业和贸易的河湖近海居民为数更多，远距离贸易和旅行中船舶已成为主要工具。仅内河船舶即产生了数十万以船为业的艚公、水手、纤夫等群体。

如上所述，宋代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是造船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同时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力量和商业力量也对推动造船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科举制度、儒道哲学和思维方式等常被视为束缚科技发展的因素。但如同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所言“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体系社会秩序在早期阶段是有利于应用科学发展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精神气质以许多方式帮助了应用科学，如激励发明就是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做法。宋代造船不论是船舶数量的剧增，还是核心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国家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漕船和战船制造需要，宋代使用了船模放样技术，即将规定的船舶制成船样，发放各船场依样放大制造。这在官府统一管理的高度组织化的船场系统中才能有效推行。

船闸和船坞的制造也是如此。公元984年，齐维岳主持制造了中国第一座运河水闸。之后，宋朝在淮南运河和浙西运河逐步推行改堰为闸，大大提高了运河的通航能力。船闸的修造和运行成本很高，而且需要严格的维护人员和启闭制度，靠民力力量难以完成。船坞为大中型船只维修提供了方便。最早的船坞是熙宁中在开封金明池修葺的大澳，用于龙船的维修和停泊。南宋江防镇建康府也修造了类似的战船大屋二百五十间，立闸启闭。之后，宋朝在淮南运河和浙西运河逐步推行改堰为闸，大大提高了运河的通航能力。船闸的修造和运行成本很高，而且需要严格的维护人员和启闭制度，靠民力力量难以完成。船坞为大中型船只维修提供了方便。最早的船坞是熙宁中在开封金明池修葺的大澳，用于龙船的维修和停泊。南宋江防镇建康府也修造了类似的战船大屋二百五十间，立闸启闭。

国家力量在造船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光明日报社理论部 主办